



中国政治学人
Acade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政党政治与 政治发展

李路曲 著

Part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国政治学人
Acade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政党政治与 政治发展

Part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李路曲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 / 李路曲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117-3082-4

I. ①政… II. ①李… III. ①比较政治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5655号

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侯天保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9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 271千字

印张: 19.75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70.00元

网址: 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55626985



序 言

本书对政党政治和政治发展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比较的需要，是从比较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我1990年开始研究新加坡政治，包括对其政党政治的研究，并于1996年出版了《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一书。到1990年代后期则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东亚一些国家，进行区域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出版了《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一书。2000年以后则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东亚的政党政治，出版了《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一书。到2005年以后，由于感到对东亚政党政治的研究离不开对欧美政党政治的参照，因为那是现代政党的发源地，政党发展的历程最长也较为完整，政党理论也是以对欧美政党的研究为基础而构建的。因此，本书主要包括了对欧美的政党政治、东亚的政党政治以及政治发展的一些基本理论和重要问题的探讨。

如果说对欧美政党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政党理论和政党发展的最新成果的解读和应用的话，那么关于东亚政党和政治发展的研究则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从政党和政治体制制度化的角度来分析政治转型问题，从而对

东亚一些国家发生或未发生政治转型的原因作出了独到的解释。西方的政治转型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政治精英的操作和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状况等来解释政治转型和政治发展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处于同一政治发展水平上的政治体系的转型与不转型的解释不够充分，换言之，它在特定的环境下似乎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些国家发生了转型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发生转型。此外，对一党长期执政的威权主义体制内为什么可以容纳较大的民主的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对政党政治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

第一，对欧美当前流行的一些主要的政党分类方法进行了分析。首先是对以政党组织形态的演进路径为着眼点而形成的一种分类方法的优长与缺陷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优长是它反映了欧美一些主流政党变化的规律，缺陷是它以一种单向的类型演变模式掩盖了政党变迁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同的政党在面对党内党外环境的变化或竞争压力时，是以不同方式作出回应的，这就决定了每个政党的类型和演进路径会有很大的不同。其次，对以党的目标和功能为基准而划分政党类型的分类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这种分类方法的优长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抽象出现代政党的普遍的目标导向或类型特征，其缺陷在于它没有与政党演进路径相联系并对其作出解释，也没有建立起令人完全信服的有效可操作的分类手段。

需要强调的是，政党是一个多方面的政治综合体，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目的出发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因为一种分类可以适用于一种目的，但可能不适用于另一种目的，因此，要想用一种分类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是很困难的。

第二，对欧美政党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变迁进行了分析。沿着欧美政党组织形态变迁的基本路径对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配置的变迁进行了分析，指出在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的发展过程中，党的中央、基层组织和党的公职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并阐明了权力转移过程和党的公职部分取得优势地位的原因，与此相关的是党的中央和基层组织从群众型政党时期在党内居统治地位到边缘化的过程。

第三，对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和民主化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宪政架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大众传媒状况构成了政党制度特色及其运作的基本的外部条件，而从以忠诚为价值取向的群众型政党向以忠诚和“问题”为纽带的全方位政党的转化是建立稳定而民主的政党制度的重要的内部条件，欧美和东亚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是其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和民主化存在较大差异的基本原因。无论欧美还是东亚，都要根据这些基本的条件以及发展阶段在各自的政党或政党制度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或者说在竞争性与合作性政党关系之间达成一种妥协，这是政党制度高效运作和提高自己的制度化与民主化水平的一条基本的路径。

第四，对政党尤其是东亚的政党在民主化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政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特征及其变化对政党作用的发挥及民主化有着重要影响，由于欧美和东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党变迁的路径也有所不同，所以在欧美政党的群众性基础瓦解之时，东亚的群众型代表性政党则成为民主巩固的重要工具，并且东亚的政党似乎只有建立起具有一定群众性和代表性的全方位型政党才能在民主巩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宪政环境对于形成既有竞争性又有包容性的政党体制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政治民主化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本书的第二部分对东亚的政治发展进行了探讨，尤其是“从东亚看中国”的视角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进行了探讨。

第一，以现代性为线索阐述了新加坡的国家构建和政治发展历程。我们知道，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是先为国族范围内建立理性的、有效而合法的国家权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进行国族构建的过程，也即民族国家的构建；继而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即建设有效而合法的能够适应更高发展阶段的现代国家制度，也即民主国家的构建；

在后一阶段，国家机器和权力的构建常常是与民主政治的构建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后发展国家在国家权力理性化的同时会受到已经民主化的早发展国家的影响，就更是如此。对于新加坡来说，它既遵循着这一基本的国家构建过程，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了一些回应，从而在理性化与民主化的国家构建的过程中达到了相对的均衡。此外，文化与认同对于国家构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从政治发展的路径来看，东亚各国或地区具有后发展地区的明显特征，正如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一样。从东亚与拉美在政治转型方面的比较来看，东亚的政治转型相对较晚并较为温和，这或许与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关，尽管东亚各国或地区自身之间也不相同。东亚的政治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确实有所不同，但这主要是政治发展的时序和实现民主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在一些基本的内涵例如人权、平等与正义以及民主内涵上则有很大的相似性，那种把东亚式民主完全看成是不同于世界其他民主模式的一种模式的观点并不准确。

第三，在一党长期执政的威权主义体制中民主的发展值得关注。在一党长期执政并没有发生国家层面上政治体制转型的国家中，竞争性民主到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近些年来遇到的新的政治发展问题。目前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东亚的一些国家中，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可能发生在中国等一些国家中。这种政党制度及威权主义体制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可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政治制度是否具有较强的现代性指向和较高的制度化水平，是否与本国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性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换言之，一党的威权主义体制如果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和较高制度化水平，并且操作得当，那么它可能在体制内容纳很大的多元竞争。

本书的第三部分在比较的视野下探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某些问题。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的某些问题，或许这是我们认识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第一，比较新加坡与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从而增加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视角。笔者指出，新加坡是民族形态的政权更替模式并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而中国是社会形态的政权更替模式并是以武装斗争方式取得政权的；新加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政权的治理方式并实行了一种软权威主义体制，而中国彻底抛弃了旧的政权并实行了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的治理体制；新加坡没有间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而中国则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断绝了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后转而走上市场化道路的；在意识形态上，两国都经历了从政治民族主义向经济民族主义的转变，并出现了自由民主的趋势，但变化程度有很大差异。这些异同对两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新加坡与中国都是后发展国家，两者在文化传统、体制形式、发展模式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都是当代较为成功的发展案例，因此，与新加坡进行直接比较，有利于阐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向度以及治理方式变革的速度和深度的效果，当然也有利于阐明发展中的问题。从政治发展进程来看，两国都是先进行政治理性化建设，然后是理性化与民主化并进。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末，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始了国家战略中心从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此后，两国政治的现代性和理性化建设相继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进。自1980年代初以后，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在坚持其理性化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从强国家向体制内的多元民主发展，中国几乎与新加坡在同一时期开始了民主化进程，不过中国更加注重政治稳定，并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以政治理性化建设为主，当然中国的政治理性化建设正在为民主化即中国特色的协商式民主的发展创造条件。

新加坡与中国的渐进式转型和改革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保证了国家的稳定性和现代性，所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的有效治理。在社会基本共识和国家领导层的主导下，两国对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进行了持续的调整和改革，使其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转型相适应，保证了经济和社会持

续较快的发展，两国或许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体制内的渐进式的政治转型模式。两国的市场化均快于民主化，这与一些国家的民主化快于市场化有所不同。两国的差异之处表现在，虽然同为渐进式改革，但中国更为渐进一些，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市场化和民主化进程在同一历史时期要慢于新加坡，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在建国后近 30 年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中国对传统的路径依赖较为强烈。当然，对于中国来说，正是由于传统的因素较强，因此其市场化和民主化慢一些与它的现实是有适应性的，在相当程度上也有利于治理的有效性。当然，这也为进一步的发展留下了隐患，这表现在传统的经济体制、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对进一步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有潜在的阻碍。

第三，从世界政治转型方式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路径。我们看到，世界政治转型或民主转型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激进性和暴力性向渐进性和温和性转变，同时，也不再完全为群众推翻统治者的革命所主导，而越来越呈现出由统治者与下层群众共同推动的改革所主导。这一变化使人们不再把民主化和政治转型视为一场革命、一场剧烈的冲突或改朝换代，而是一种改革，一种渐进而温和的权力交接。这种变化无论从实践上还是心理上都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我们在谈论“东亚模式”或“中国模式”的时候，尽管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有人把其看成是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政治发展的一种政治形态和发展模式，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在世界整体发展趋势之中的一种具有自身发展特点的政治形态和发展模式，但从政治发展或政治转型的视角来看，这两种观点无疑都潜在地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东亚一些国家和中国的政治发展或民主化进程是一种渐进方式，它不会发生多元民主政体取代威权政体的急剧转变，它是一种渐进、温和而稳定的转型或发展。进而，这不仅意味着这种转型是渐进的，也可能意味着它的转型本身不再是威权政治向多元民主政治的转型，而是一种国家治理的创新或国家“一元”的民主治理。

本书的主题一直是我关注的主要领域之一，近几年来，除了进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写作外，仍一直保持着对政党尤其是东亚的政党和政治发展的关注，以至于关于东亚或新加坡的某些案例经常成为我阐述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案例。这也是我近几年来学术研究的特征。当然，由于本书所涉及的领域广泛，尤其是水平所限，因而毋庸置疑，本书中对所有问题的研究都还有很大的不足，有待于学界和所有读者的批评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侯天保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我的研究生陈慧雯、周玲敏、吕进、张飞龙、高俊龙、凌海、孙其宝、李晓辉、陈煜享，他们帮助我做了部分书稿的整理、校对、注释及参考书的整理工作。本书的出版获得上海师范大学重点学科经费的支持。

李路曲

2015年10月28日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序 言	1
第一章 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发展	1
第一节 政党的类型学	1
第二节 欧美政党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变迁	18
第三节 导致欧美政党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	30
第四节 党的基层组织地位的变化	33
第五节 欧美民众对政党的冷漠情绪及其原因分析	38
第六节 政治市场化对政党民主的影响	50
第二章 政党政治与民主化	65
第一节 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和民主化的变迁	65
第二节 政党在民主化中的作用	77
第三节 当代政党和政党体制在民主巩固中的作用	91
第三章 东亚的政治发展	105
第一节 东亚的两种政治发展模式	105
第二节 一党长期执政与民主的空间	123
第三节 后发展国家法治社会构建的政治生态分析	129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四章 新加坡的国家构建与政治发展	148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新加坡的国家构建	148
第二节 当代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模式	169
第三节 新加坡的精英主义与高薪养廉	190
第四节 执政党与反对党及民众的关系	202
第五章 比较视野下中国的政治发展	213
第一节 当代政治发展中的新加坡与中国模式	213
第二节 新加坡与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比较分析	229
第三节 世界政治转型方式的变化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252
第四节 中国民主化的路径、动力与模式	262
英文参考文献	283
中文参考文献	295



第一章 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 政党的类型学

本节对欧美当前流行的一些主要的政党分类方法进行了分析。首先，是对以政党组织形态演进路径为着眼点而形成的一种分类方法的优长与缺陷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优长是它反映了欧美一些主流政党变化的规律，缺陷是它以一种单向的类型演变模式掩盖了政党变迁的多样化，实际上，现代政党在面对党内外和国内外的竞争压力时是以不同方式作出回应的，这决定了政党的类型和演进路径会有很大的不同。其次，对以党的目标和功能为基准而划分政党类型的分类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这种分类方法的优长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抽象出现代政党的普遍的目标导向或类型特征，其缺陷在于它没有与政党演进路径相联系并对其作出解释，也没有建立起令人完全信服的有效可操作的分类手段。

一、组织形态的演进与政党分类

精英型党、群众型党、全方位型党和卡特尔型党是从组织形态上来确定政党演进路径和划分政党类型的主要方

法，这一演进路径基本反映了欧美主流政党组织形态发展的过程，其分类方法还创造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类型学理论，因此，在研究和肯定这种演进路径和分类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着眼于分析它还存在的缺陷，并对另一些新的分类方法进行分析，以求进一步丰富政党变迁的理论和类型学研究，是加深对政党变迁和特征的认识所不可或缺的。

精英型政党与群众型政党的划分来自于迪维尔热 1954 年出版的《政党》一书。迪维尔热指出，干部型政党主要产生和活动于立法机构之中，结构松散，以精英为中心，在立法机构之外没有党的组织存在。而群众型政党有发达的组织，它渴望把自己的支持者或选民都发展成党员。因此，通过分析党员占选民的比例和比较议会内外党组织的活动程度与范围可以区分这两种政党类型。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欧美只有精英型政党，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则主要是群众型政党，此后开始向全方位政党转型。

迪维尔热的分类主要是从政党的起源、组织形式、党的阶级基础和组织需求来观察的。精英型党虽然结构松散和以少数精英为核心，但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能够使它募集到所需要的资金、动员所需的资源和确保中上层阶级的利益表达。与此相反，处于体制外的工人阶级不得不通过强化组织来募集资金和动员大量的人力资源，从而形成群众型党。迪维尔热把群众型党作为一种比精英型党更为现代和优越的组织形式，这是群众型党超过精英型党而居支配地位的原因。这种变化趋势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状况，现在关于政党已经衰落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来自于这一理论，因为它把政党组织规模看成是政党是否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准。实际上，这种分类理论比较容易划分传统政党的类型，但对现代政党的划分则不那么有效，不过，它仍然是划分现代政党方法的逻辑起点。因为尽管政党的组织规模和形式不一定是政党功能特征的主要承载者，但它们仍然可以反映政党的不同特点。

现在使用的精英型党（更多的已经称其为干部型党）和群众型党的划分已经与迪维尔热的划分有很大不同。现在把干部型党描述成组织松散和党员

数量较少的党，已经与现实有很大差距，今天的干部型党已经很少有像迪维尔热所见到的法国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那样的组织松散和难以表达群众利益的政党，而那些政党正是迪维尔热提出的干部型政党的原型。例如，过去的右翼和中间政党已经被组织良好的戴高乐党、保卫共和联盟（Rally for the Republic）和法国民主联盟（Union of Democrats for France）所取代了。法国民主联盟是几个小的政党俱乐部的联盟，旗下各个政党都是干部型党，例如共和党就是如此。但是保卫共和联盟则很难界定，该党虽然有大量的党员，但是没有广泛的参与。党员众多是群众型党的特点，而普通追随者没有参与则是干部型党的特点，这样，它既不是一个干部党，也不是一个群众党。社会党尽管有数量较多的党员，但也不是一个典型的群众型政党，在1971年与密特朗领导的共和联盟及其他左翼组织合并后，它利用派系结构联合了不同的政治俱乐部，并向左转，但是它并不具备群众型党那样有众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具有广泛参与权的特点。所以，从组织形态来看，干部型党和群众型党都与自己过去的经典模式不完全一样了。

并不只是法国的政党以迪维尔热的分类难以界定了，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显示出绝大多数欧美的政党，由于法律或其他原因，无论大小都有一定的正式组织和稳定的成员，大小政党的界限模糊。因此，按照迪维尔热的分类方法已经很难对现代政党进行划分了。库勒在研究了荷兰的政党后说，荷兰的政党应该被看作是“现代干部型政党”，因为它们所登记的支持自己的选民中成为其党员的人数是很少的，这说明它没有众多的党员，但那些积极成员一直把党作为自己活动的基本场所，这又说明党有稳定的支持者和基层组织，因而兼有迪维尔热分类中群众型党和干部型党的特点。由此，库勒列举了现代干部型党的五个特点：

第一，职业领导集团，特别是党的议会党团，在党内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它们对于党的下层有高度的责任感。第二，党员占支持党的选民数的比例很低，党员较少；党员或下级组织仍然是征募党的领袖的中介，仍然是保持

党的工作程序的必要结构。第三，党有明确的选民取向，为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党纲的兼容性很广泛，但其战略既不是全方位的，也不是仅仅聚焦于一个阶级，而是依据形势变化呈中间状态。第四，保留了群众型政党的垂直的组织关系和结构，不仅保持了特有的形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捍卫了党内民主。第五，资金既依赖于公共补贴，也依赖于党员和支持者的党费及捐助。^①

这些特征可以把荷兰的现代政党与早期经典的干部党和群众党区分开来，但是并没有把荷兰与其他国家的现代政党区分开来。例如，现代加拿大的政党与荷兰的政党有很大的不同，其全国性政党和地区性政党都有稳定而联系紧密的领袖集团，他们支配着议会和政府；然而，在议会之外党的组织和活动是很少的，除了在选举时期举行党的会议外，很难显示出其组织的存在，主要的政党都没有固定的党员，任何人都能加入到挑选党的候选人和代表的队伍之中；党的领袖是由党的特别会议而不是由党的领导集团推选的。没有大量的党员和稳定的基层组织并不妨碍完成党的任务，党可以依赖招募义务工作人员进行选举。党的议会党团无论是处于执政地位还是在野，都很活跃。因此，加拿大政党典型的情况是，党的领袖和核心成员是平时唯一可见的党员，相互联系紧密而不松散；党的组织架构并非不存在，但纪律松散或没有纪律。

加拿大的政党也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干部型党，但是它们显然与荷兰的政党有区别。例如，尽管加拿大政党的多数党员和支持者比荷兰政党的党员和支持者与本党上层的组织联系少，然而他们在党内却有更多的权利，更多地介入了党的公职候选人提名和选拔领袖的过程。同时，他们承担的责任是含糊的，不像其享有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选举权利那样清楚。党的领袖在选举时宣布党的政策，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在当选后并不受这些政

^① Ruud Koole,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Modern Cadre Party in the Netherlands", in R.S.Katz and Mair (eds.), *How Parties Organize: Change and Adaption in Party and Organiz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London: Sage, 1994, p.299.

策的约束。在位时，党的领袖通常不会受到批评，尽管党员在两次选举之间的间歇期也可以批评党的领导，但只要被批评的对象上台执政，这种批评就要终止，显示了执政的重要性和党的公职部分的主导地位。当党失去执政地位后，党的领袖可能会遇到挑战，这时，如果不主动辞职，他们就很可能被党的议会党团或党内派系所推翻，而不必由决定其上台的党员群众决定其去留。

以现有的标准对美国的政党进行分类也会遇到困难。美国政党的各地方组织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与各州的差异有关，而党的全国领导机构只是一个无实权的空架。不过现在党的全国委员会已经更多地参与组织本党的国会选举。当然它不是唯一的参与者，候选人尤其是那些担任公职或担任本职的候选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己的竞选组织与党的全国委员会竞争以募集资金。党的全国委员会并没有党的领袖的提名权，候选人是由地方党组织提名的，并且各候选人都有自己的标识和竞选组织，这些组织也不受党的全国委员会的领导。由于美国的政党是一种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派系竞争的框架组织，因此它只能被认定是干部型党，但是，它不仅与迪维尔热的经典的干部党不同，而且与加拿大和荷兰的现代干部型党也有差异。

维尔试图通过提炼迪维尔热的分类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对精英型党和群众型党进行了重新界定。^①他指出，一些以精英为中心的党，像英国的保守党和法国的戴高乐党，都有较多的党员，但是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少数人支配着党。与此相反，以党员数量为基础的党是那些党员不仅是受党的领导支配的劳动力，而且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实际权利的党。这样，不是党员的规模导致了政党之间的差异，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其参与度导致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都可以拥有众多的党员，例如绿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就是如此。我们可以把维尔的这种分类方法看作是对迪维尔热方法的修订或补充，即成员介入的程度、或者是积极成员的数量成为分类

① Alan Ware, *Citizens, Partie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